

新思汇

中国文化：生命之学的礼赞

——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成立暨牟钟鉴先生《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出版座谈会纪要（续）

时间：2018年6月15日下午

地点：中央民族大学；

整理编辑者：李攀、段海宝

主要内容：

俞学明：与西方的“丛林文化”不同，中华文化更像“雨林文化”

郭小武：儒学治国，道学治身、佛学治心

李存山：牟先生在三新方面均有贡献：返本开新，综合创新和推陈出新

何建明：牟先生诠释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三教互补，开发包容

田辰山：牟先生讲中华文化以“一、二、三、多”概括，宜于国际传播

赵卫东：牟老师说：讲齐鲁文化，“儒强道弱”不是一个良性的学术生态

章伟文：主体性、超越性和开放性是牟先生中国文化思想的三大主旨

孔德立：“三教关系简明通史”为中外大学生学习中华文化提供了理想的范本

王志捷：以仁为体，以和为用；这是牟老师身体力行的中华文化精神

马晓英：牟老师的气象：儒家的淑世与道家的洒脱

宝贵贞（中央民族大学宗教与哲学学院教授）：各位与会嘉宾，大家下午好。我是中央民族大学哲宗学院的宝贵贞，蒙导师厚爱，受刘院长委托，下午这一场发言由我主持。

今天下午的主题非常明确，是牟钟鉴先生《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一书的出版座谈会。记得在两三年前，导师刚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心情其实是很矛盾的，所谓“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以先生这样渊博的学识，撰著出的必然是可以传诸后世的学术精品，我的内心是充满期待的；忧的则是先生年事已高，且先生向来对学术研究的态度极为严谨，撰写著作必然劳精耗神，我很担心他的身体状态。去年年底，当我知道《通史》已经到了最后的校勘阶段时，就非常期待能尽快读到这本书。直到前两天，我才拿到《通史》，还没来得及仔细阅读，对书中义理深微之处体悟还很粗浅。幸好今天上午各位嘉宾给我们做了很好的导读，我觉得受益匪浅。

下面有请中国政法大学哲学院俞学明老师，我们有什么活动，或者学术答辩，经常请她过来，我们是二十年的老朋友了，有请！

俞学明（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谢谢主持人！非常荣幸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刚才我发了一个朋友圈，还有朋友在朋友圈里跟贴说错过了，我特别想说我没错过这个盛会。

今天要祝贺三个事情：第一是代表我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祝贺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成立！第二是祝贺牟先生《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出版！第三是祝贺牟先生80大寿！牟先生跟我们之间关系渊源很深。我们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成立的第二天就请了牟先生。牟先生说，我很高兴到昌平，因为这是我年轻时战斗过的地方，修过铁路的地方。牟先生也是政法大学的兼职教授，也亲自培养过学生，讲过课，是硕士生导师。所以我们跟牟先生的关系一直很亲近。

这部书我是今天才拿到的。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仔细翻了一下之后发现，您这本书是在三教关系课程的基础之上逐渐形成的。这几年我在学校里开了三教关系的课，但是我一直

很困惑，虽然有很多老师在做三教关系的研究，但是现在很难找出一本能够当作教材的线索性著作。我发现我的课有教材了，结束了要给学生大量资料的同时却缺乏完整的线索教材的历史。借此机会，我想表达感恩之情。

关于牟先生这本著作，我有三点体会。

第一，这本著作对于我们了解儒道佛三教关系的发展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一般讲三教关系都是从两汉之际开始讲，也就是佛教进入中国以后才讲。但是其实佛教传入以后所面对的不是纯粹的儒家，也不是纯粹的道家，而是经过儒道互动以后所形成的文化样态。所以牟先生从中华文明的起源讲起，更完整地展现了三教关系发展的线索。同时，借由这样的三教关系的发展历史，进一步让我们了解到整个中国文化的脉络，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第二，我关注到牟先生这几年的成果，您在讲三教关系的时候纳入世界文明的四种模式，讲中华文化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中的一种模式，从文明模式的意义上讲“多元通和”的文化传统，这个意义非常重大。我们以前讲到中华文明的时候，基本是按照西方近代以来文明的话语体系下叙述的。您现在回溯历史早期，从文明发展史中讲出四种框架，这突破了原有西方文明的话语体系。我从2011年开始参与通史核心课程——中华文明通论的讲授，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体会到讲中华文明的时候应该怎么讲：要么就是不断辩解式的，如我们有什么独特的意义；要么就是在叙述某一个问题的時候，即使不想辩解也会非常努力地叙述，比如我们会努力按照西方话语体系来思考并讨论中国是不是有宗教的问题，我们有大量的思考和叙述还是处于西方话语体系下的。牟先生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视阈之下，叙述中华文明自己独有的框架体系，这是非常有启发性的。而且后学者在《三教关系简明通史》的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无疑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第三，我们现在一直在思考未来文明往哪里去的问题。现在中国一直在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我更重视的概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我觉得如果可以比拟的话，当代世界文明体系的建设，有点类似于战国时代。你能看到经济、人口、国际关系成为整个社会交流非常核心的方式，战争反而成为辅助。大家都看到了文化交流互鉴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像是战国时孟子不断强调要“定于一”一样。在我的理解里面，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文明，不仅在于它很早就呈现出文明的特征，还在于很多关于文明如何共处如何发展问题。

我们经过了非常长成熟文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相当于40岁以后的人，甚至是60岁以后的人去思考我们的人生应该怎么过，我们的社会应该怎么存在并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文明中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就跟其他文明是不同的。比如说讲治道的问题，重视有秩序的社会而不是过于活跃的社会，更多是节制发展的社会，是长治久安，将稳定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目标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目标之下，然后再去考虑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怎么做，社会治理应该怎么做的时候，跟年轻的20多岁的人去思考的未来是不一样的。我经常会感觉到，现在的西方文化是现代科技发达以来形成的现代文化，其实相当于二三十岁的人制定的社会发展目标，不断有一种冲劲，有一种力量，但是往往会莽撞的，冲上去之后也会留下一系列后遗症。大家总结的分久必合，这是经过很长的成熟社会发展之后，再去思考怎么样活得更长寿，怎么能够健康地活得长寿，这样的问题跟年轻时的思考是有所不同的。

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牟先生所总结的中华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非常好地解答了多元文化在社会体系中如何共生的问题。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粗略的区分，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可以用一个很时尚的词——“丛林文化”比喻的话，我们中华文化有点像雨林文化，会容忍各种元素在这里面共生。在共生基础之上，各有各的规律，有自己的规则和“道”，有发展的脉络。整个中华文明经过两千多年所形成的“多元通和”的发展模式，在儒道佛三教关系格局下，实际上呈现出来的就是雨林文化共生互动，非常成熟又具有韧劲的文化形态。从这个意义我再去阅读牟先生的著作，不仅对既往的历史提供了新的理解视角，更在于面对

未来文明怎么建设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案。

因为时间比较仓促，我就先讲到这里，非常感谢牟先生给我们提供非常宝贵的财富！也希望牟先生能够健康长寿，推出更多的好作品！

宝贵贞：谢谢俞学明充满感情的发言！既有对著作的解读，也有她和我们学院，以及和牟先生长久的学术交流。现在邀请社科院语言所的郭小武老师发言，我不是很熟悉郭小武老师，但是我知道他是社科院语言所工作，也是做中华文化研究的，有请郭老师。

郭小武（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感谢主持人。前不久还听到牟先生给我们讲解三教关系。今天出席这个盛会，我特别高兴。首先祝贺民大中华文化研究院成立，特别祝贺牟先生《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出版。

牟先生的《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让我耳目一新，豁然开朗。三教多元综合，三教归一非常明显是中华民族大的文化脉络。第一条是儒学治国、道学治身、佛学治心，讲得非常好。第二点儒学正心、道学静心、佛学净心。第三是儒曰养性，道曰炼性，佛曰见性。这个很多人问，我们老所长也非常关心这个事，他研究认知和传统文化对语言的影响。第四，儒学乐生、道学养生、佛学悟生。第五，儒家入世、道家避世、佛家出世。这些都让我深受启发。道和佛比较接近，比如第二点和第三点。第二点儒家是正心，道家是静，佛家是净，静和净是比较接近的。第三点儒家是养性，而道家炼性和佛教见性无疑更接近些。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个所谓天人合一的问题，天人合一实际上跟多元通和是比较接近的。

老子的《道德经》里面就有，庄子也明确提出来，还有一个是《易经》，里面天人合一的观念是比较成熟的。《易经》“天地氤氲，万物化醇”，“天地氤氲”的这个“氲”字，在《说文解字》有一个解读是“壹”。为什么说天人合一呢？天人合一就是天人合壹，氲氲就是混沌不清的样子，在《庄子》里是比较明确的，天和人是二而一的关系，《老子》也说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混沌，就是融合的思想，就是贯通的思想，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三教合一，三教打通和多元综合，三教归一，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纲领。谢谢！

宝贵贞：谢谢！从哲学或者宗教哲学上讲了天人合一的问题，谢谢郭老师。下面有请社科院哲学所的李存山老师。

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荣休研究员）：非常荣幸参加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的成立，感到特别兴奋的是牟钟鉴先生的新著出版。前两年就拜读过牟先生相关著作，拜读之后倍受鼓舞。中国文化的系统从三教关系来讲，牟先生提出了“一、二、三、多”的模式，其中的“一”就是强调儒家主导，牟先生对此做了非常精要的阐述。牟先生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三新说：返本开新、综合创新和推陈出新。我当时看了以后就觉得，牟先生的构想和港台的是不一样的，而且能够得到大陆学界的广泛认同，不仅是宗教学界，还有其他学科的学者，乃至整个社会。研究文化的确需要创新，但我觉得还是应该以一个比较客观的、系统全面的认识作为创新工作的前提，这样的话创新出来的成果也能够得到广泛认同。因为文化毕竟是要推陈出新的，是要有新的发展的，如果没有客观全面的认识作为前提，创新出来很多观点，但彼此之间分歧，就会给社会思想造成混乱，让人无所适从。牟先生的新著《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经过上午的座谈，发现有很多共识，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有了共识才能更加明确发展方向。我看到简介里面特别提到“体现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一个前提就是文化自觉，没有文化自觉就没有文化自信。而文化自觉就是必须对中国文化有一个深刻、系统、正确认识的自觉。我们讲中国文化要返本开新，其实就是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模式，对这个模式进行讨论其实就体现出树立正确认识的自觉，有了这个自觉就可以明白中国文化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模式去发展，如何推陈出新。有了正确的方向才有自信。没有自觉，就没有正确解决当前文化建设如何发展的方向问题，文化自信往往也落不到实处。

牟先生这本新作，明确提出了一个既有主体性，又有开放文化交流多元的文化模式。有

很多是大家认同的，比如三教合流。当然还有其他的宗教、其他的文化也被融合进来了，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除了佛教传到中国来，还有其他的宗教也传到中国来了。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处理宗教关系，无疑具有积极意义。表述成“多元通和”很有新意，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也指示出了中国文化将来如何发展的方向。

关于儒家主导，首先涉及一个对儒学性质判定的问题。牟先生在书里面说：“我虽然不认为儒学是宗教，然而肯定它有宗教性。”这里的宗教性是儒学从上古时代的宗教中继承来的，成为中国人宗教超越性价值的源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宗教性就转化成为以人为本，以道德教化为宗旨的价值观念了，这种价值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牟先生又说，中华民族由于有儒学而走上清明安和的人文主义道路。牟先生这些论述，使我想起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的一段话，其他民族的宗教最高的神是创造世界的，所以神不在这个世界当中。中国从尧舜开始，就是在人世之中，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又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特长。所以，中国文化可以说是有宗教性的，孔子就在此基础上创建了儒家人文主义的哲学。

在中国上古时期的文化传统中，孔子对尧舜是极为重视的，所谓“祖述尧舜”；从尧舜开始讲最能够体现儒家文化的价值渊源。如果没有儒家文化的主导，我想不会形成儒道互补、三教合流。我也想，中国之所以能够不像其他民族的宗教文化那样有排他性，中国之所以能够涵容多种文化，主要还是在于把最高的价值取向立于现世生活上，孔子就是要在现实世界开辟一个新的世界，以现世生活为最高的价值取向，这样的话凡是其他宗教只要对现实生活有利，对民众有教化作用，可以满足一部分人精神需求的就可以存在和发展。如果把彼岸世界的救赎之路作为唯一的价值取向的话，必然会产生多种教义上的冲突，就会产生排他性。这可能是中国宗教文化多元并存的原因。

我到意大利参观古斗兽场，当时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当基督教进入欧洲的时候，取代了原来的古罗马文化。为什么古罗马文化能够被取代呢？古罗马文化可能缺乏一种爱人的精神，把人与兽进行搏斗当成一种娱乐，这就相当于把人当成会说话的工具。而佛教传到中国来，也兴盛过，但是最终没有取代中国原有的文化，我想这和儒家文化的爱人精神是相关的，这种爱人的精神提供了多元宗教文化的底蕴。所以，儒家在形成多元宗教文化和平共生上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

关于儒道互补，体现了人文化成和返璞归真的互补。说到儒道互补，不但是整个中华思想文化的大事因缘，从个人来说，儒道互补使得人的生命变得更为充实丰盈，内外、我物、心身、德业之间的关系更为协调、更为圆满，这个不仅在中国思想文化史当中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生命也有着深刻的影响。牟先生的人格是很高尚的，知行合一、儒道互补的精神气质在他身上表现得很明显。跟他的接触过程中，听其言，观其行，从他的言行中经常感受到对社会的责任担当，对社会的忧患意识，这是受儒家的文化影响。但是牟先生又能潜心治学，有返璞归真的追求，这是一种道家的精神。所以，我说他把道家精神和儒家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这样一种高尚的人格。儒道互补是中国精神发展史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站在世界哲学角度来看，孔子和老子无疑是两个巨人、两个伟人，把他们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不仅是儒道互补，还有儒道佛三教合流。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实现了中国化，这是中国文化融会外来文化，也是文化之间和平融汇的成功范例。牟先生在这本著作中对儒道互补和三教合流都有非常精彩的论述，比如儒家与道家的互补是人文与宗教的互补。又如儒家的人文理性提升了道家、佛教的宗教理性，从而有效地避免了中国宗教向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又如道家和佛家的信仰和彼岸向往的追求，弥补了儒家世俗主义的不足，等等。

三教并存，也是有冲突的，但是融汇交流以后，就是相得益彰的关系。如果没有佛教的传入，宋代的新儒家也达不到那种思维的高度。我觉得三教还是相得益彰、互为补充的关系。

牟先生认为中国人对于宗教之“教”的理解起初就是教化,尽管后来佛教传过来,也形成了本土宗教道教,但是在中国实际上本来的意义还是教化为主,这跟西方文化中对宗教的理解是有分别的。

三教中每一个教内部又分为宗教与哲学两家,牟先生的这个观点很有创见,是一个很有必要深入挖掘其意义的理论,对于儒道佛三教的继续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另外牟先生说,研究三教关系与研究一教互为前提,我认为这是牟先生多年教学和研究工作的经验之谈,这对于我们今后做研究,不管是研究儒家还是研究道家道教,还是研究佛家,都应该有一个三教关系的思考维度,只有这样的话才可以有更深入的理解。

总的来说,牟先生对三教关系的研究,真正具备了深刻、系统、正确认知中国文化的自觉,有此自觉才能有文化创新的自信,才能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实现更大规模的碰撞、交流、互动。我觉得我们讲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就在于在文化模式上要树立起一种自觉意识:即便是现在的中国文化,其实还是离不开原来发展的模式——这当然不是要简单盲目地排外。牟先生的返本开新、综合创新、推陈出新是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以上就是我的感想。

宝贵贞:谢谢李老师!下面有请人民大学的何建明老师。

何建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非常感谢,首先要祝贺中华文化研究院的成立,其次要祝贺牟公八十大寿,第三祝贺《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的出版,这些都是了不起的事情。

今天上午有几位都谈得非常好,民族大学成立中华文化研究院,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今天上午陈鼓应先生也提到1996年在北京举办的“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那次会议规模非常大,我在那次会议上宣读了一篇论文,我没想到牟先生非常欣赏这个论文,专门找我,我从此就跟他结缘了。2003年我到人民大学之后又跟牟先生结了缘,我觉得非常荣幸。中华文化研究院成立和《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出版,我觉得都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有什么意义呢?近几年我感到特别头疼的就是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问题,传统文化不仅只有儒家文化,还有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近几年我都在开办道文化夏令营,但“夏令营”这个词已经不敢用了,那就搞成公益文化活动吧,现在又说所有的活动包括公益文化活动也不能搞了。牟先生从三教关系的角度撰写了这部著作,启发我们去重新思考什么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如果你要谈中华文化,是不是只有儒家的?是不是只有世俗的文化呢?我们今天谈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要弘扬、要发展什么样的中华传统文化呢?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的出版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本书里面多次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就是三教互补,以及对其他文化的包容。我们要传承中华文化,就应该看到中华文化有世俗性的部分,也有非世俗性的部分,有儒家也有道家佛家和其他文化,我们就要承认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入世法里面的优秀传统文化,还有出世法里面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就要重新认识:我们到底弘扬什么样的中华文化,弘扬什么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觉得今天这个会意义很大。至少在这点上,我很感谢牟公,因为您的影响大。

前几天我拿到牟公这本书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您的那本《新仁学构想》。我个人觉得新仁学的构想是论,而《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是史。我对照了一下陈来先生的《仁学本体论》,他非常强调仁本体的建构,很少谈其他的,佛教、道教几乎不谈。而牟公是强调生命哲学,生命哲学恰恰可以把中国文化里面的多元成分都可以吸收进来。

在《新仁学构想》著作里面起了个副标题:爱的追寻。爱是很了不起的词。我二十年前,在美国跟一个基督教牧师吃饭的时候,谈起来什么是宗教的本质,他说就是爱,宗教最终是要体现爱的。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那些真正的哲学、伟大的哲学谁不体现出宗教的爱呢?没有爱的宗教还叫宗教吗?

60年代,您就已经了解了儒道佛三教的教义,到70年代末期参与任公组织编写的《中

国哲学发展史》时您才算真正进入到儒道佛三教关系的这个领域，在三教关系领域您深耕多年，对我的思想也有很大的影响。我本来对儒学是有偏见的，因为我接受了伦理异化的关系，比较强调儒学在后来的发展中变成了伦理异化，跟早期儒学不同，已经变成很制度化、很礼制化的东西，是跟封建的专制统治相结合的东西。但是读了您的著作后，您主张把这种制度化的儒家和以仁学为真血脉的儒家区别开来，这让我的思想很受震动，促使我去反思伦理异化的说法。我很注意您对礼学的批判，在这一点上您和陈来先生有很大的不同。您特别强调仁学，您也谈到仁学对佛教和道家的影响，这就体现出三教合一的特点。康有为也用佛学，洋务会也研究道教，这种本身就是三教融合。在您的《新仁学构想》里，其实就体现出了三教融合这个思想。您一再提到，仁、和、生、诚、道、通，这也是道家道教思想的核心，也是佛教佛学思想的核心。只不过仁在道佛里面用了别的名词，比如慈悲、慈爱等，实际上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像和合生成、道通为一，这是三教都用的，都非常强调的共通的价值观念；您的大作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通和结构，我是非常认同的。我们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单一化、简单化地理解为某一种文化占主导。当然，我接受您说儒学是主脉底色，您用的名字就是新仁学，因为仁讲的就是一种爱，并没有说仁是孔子说的，所以仁就只能是儒家的，您其实是在接着讲，既关照当下，又融贯今古今中西，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最后，我想讲两点。第一，牟公这部新著从学术的角度指明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三教紧密互动，为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做了学理上的论证，并昭示出这一点：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既包括儒家，也包括道家、佛家和其他文化。第二，牟公的新仁学是建立在以儒道互补为主脉，兼容东西方各种不同思想文化的基础上的。这种理论探索是极为有价值的，我们应该为之鼓与呼，应该给予很大的赞美。我还有一个建议，中华文化研究院成立后可以组织一次牟公跟陈来的对话，因为他们都创立了新的仁学理论，我相信这一定会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的活动，肯定会有很多人来参与的。

宝贵贞：谢谢您的建议，我会把你的建议转给我们院长，谢谢！下面有请外国语大学田辰山老师。

田辰山（北京外国语大学荣休教授）：非常荣幸能参与今天的盛会！我跟牟老师是2002年在夏威夷认识的，刚接触时，对牟老师的学问其实谈不上有很大的了解，最先打动我的是牟老师的为人。我跟牟老师结识这么多年来，一直很融洽。牟老师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通过学习牟老师的学术著作，吸取其中的精华，给我自己的学术思想带来很大的提升和进步，甚至在我自己心里，也暗暗地以牟老师为榜样。牟老师身体不好，在这样的高龄还撰写出这么厚的一本书，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

今天也恰逢中华文化研究院成立，我一听研究院的这个名字就非常有亲切感。我想，将来研究院可以和北外合作。我自己本来不是在哲学领域的，一开始我的领域是政治，研究政治哲学，又从政治领域进入哲学领域，跟随安老师研究比较哲学。对于牟老师这本书所研究的三教关系，其实我本身并没有多少研究，但是有一个很巧的事，《世界汉语教学》找我，题目就是谈谈对儒释道三家的看法，我就凭感觉和印象谈了一下，主要观点就是：儒释道是不分的，儒释道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个宇宙观，同一个人生，是从不同侧面。因为我也教外国人《中国哲学概论》，教一个学期，从古代哲学儒家、道家，讲到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讲到现在的自由主义。所以，对三教多少知道一点，材料也是我自己找来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些不充分。牟老师这本书，我感觉非常有一个地方就是我如果教《中国哲学概论》的话，这将是很重要的一本参考书，我要在课堂上讲儒释道三家的话，这就是材料，而且梳理得很清楚，虽然来不及细看，只看了目录和一些章节，但我觉得很精彩，我非常喜欢这部著作。我跟着安老师的团队做事，主要工作就是把中国文化介绍到国外去，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教材。

牟老师这本书用中国文化自己的语义环境来阐释儒释道三教的关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把这个东西翻译成外国人的语言,讲给外国人听,外国人是可以听懂的。特别是牟老师强调的三教融合,牟老师用的是“一、二、三、多”,换成我们比较熟悉的说法,就是中国文化自己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有一种尚合而不尚分的特征,在这样一种语义环境下看待儒释道,就特别强调了融合。为什么?因为西方是分,而中国正好是不分的。从这个角度上讲给外国人听,我就有材料和教材了。

我在教中国哲学的专业外语,说是教专业外语,实际上就是教哲学,不是从语言上去讲,而是从哲学、文化上去讲。在讲比较哲学课的时候,就要讲到中国的儒释道三家,从先秦讲起,还要讲到近代和现代。在阐述这些哲学思想的过程当中,要是用英语表达的话,应该是怎么样表达?中国传统当中的各家各派,如果从比较哲学的角度来看,整个中国思想文化传统讲的就是合,是联系在一起的,分不开的。西方恰恰讲的是分开的,西方人用的概念是聪明哲学,聪明哲学有一个特殊的内涵,就是个人跟所有人之间分开的状态,一直延伸到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其实根源都是在这里的。西方人解决问题之道是要斗、要打。宗教里面讲爱,但是西方那个爱跟我们不一样,他们那个爱跟上帝分不开,我们这个爱跟我所在的这个群分不开。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我们要特别注意,要增强中华文化的话语权,强化话语意识。我们的话语当中掺杂着很多西方的概念,比如本体、理性、一元、二元等都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东西。翻译成中文以后,在中国人里面讲都把它们认为是自己文化固有的概念,但是如果这个文字翻译成外文给外国人听的话,他就完全按照他的语言文化环境来理解这些概念,误读和误解就产生了。这就涉及一个问题:我们要把自己的文化宣传出去,要用西方语言翻译汉语的概念以及一些哲学术语的话,得想一个妥善的办法给处理好。要跟他们说,这个词汇是中国语义环境当中的词,不能完全按照外文那一套语义环境来理解,就像“本体”这个词汇在中国文化当中有自己特定的内涵,实际上跟西方文化有很大差异的,而且还得把这些差异性的地方给讲清楚。我们处的这个时代确实是新时代,中国崛起,从经济崛起到政治崛起,整个全球格局都在变化,这个时候是非常需要中国文化的。中国文化要走出去,要说自己是原汁原味的中国东西,就得避免因词汇带来的种种误读和误解。在这一点上,有一些词汇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不一定是这个词汇不能用,但是一定要说明清楚,可以加个注释说明一下,这个词不是英文的词,比如说,这个“理性”不是英文的“理性”,是中国的“理性”,中国的“理性”实际上是综合地看问题、全面地看问题、历史地看问题的意思。但是西方的“理性”是线性的,打个比方,我有一个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就得走一定的路线,这个设计并实现目的的方式方法就叫理性。

所以我们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出去,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注意。一个问题是在现在的话语权力结构上实际上是不对称的,不利于我们中国文化的,导致有些问题我们不知道怎么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不能用中国文化去说西方的,否则就成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我们可以用中国文化给一些问题以恰当的说法。我们现在能接受的西方文化,甚至能接受自己的文化已经深深打下欧洲的印记,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对人和历史的看法,有一个前进的观念,这是西方传过来的历史观。我们在面对西方的时候,其实也跟我们本身哲学文化的研究有很大的关系,有种不对称的感觉。这个不对称实际上就是用西方的理论框架、西方的概念来说中国文化,来理解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西方人刚开始介绍中国的时候,就是基督教传教士在其中做了很多工作,他们用他们的基督教观念体系来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甚至英汉字典这些东西都是这么编写出来的。“我是一个学生”,这个说法差别就非常大,中文语境下的“学生”是学什么内容,跟西方语境下的“学生”就不一样,视野也不一样。如果把中文的“东西”翻译成英文的“东西”,像这种最简单的词汇都存在问题,哲学的语言和文化的语言就更是问题多多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经常把西方的“买东西”就当作是中文的“买东西”,“自由”就当作是中文的“自由”,“人权”就当作是中国的“人

权”，我们现在要这样去看待问题的话是不行的。“拜拜”都在说，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拜拜”是上帝保佑的日子。当然我们没有这层意思，我们中国人以为拜拜就是再见，但是你把这个词翻译出去让西方人理解，就会有误读和误解。这种误会特别多，特别是有了西方的思想文化长期处于强势地位的经历以后，我们学了很多西方的思想、习惯、生活方式，我们现在周围充满了西方的词汇，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西方词汇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们是融合的、包容的、接纳的，但是我们也得知道接纳的是什么，是怎么接纳的。

读了牟老师的大作非常兴奋，随便说两句，谢谢大家。

杨桂萍（中央民族大学宗教与哲学学院教授）：各位老师下午好，谢谢大家为了庆贺三件喜事从早晨9点半一直坐到现在。接下来的这场讨论汇聚了中青年一代的学者们，下面有请赵卫东老师。

赵卫东（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各位前辈，各位老师好，我来自山东师范大学。我和牟老师的交往比较深，首先和牟老师是老乡，是山东人。在2002年到2005年之间，当时牟老师被聘为我们的学术委员和校外专职研究人员。牟老师申请了一个国家课题，我也参与了这个国家课题，从此之后就 and 牟老师认识了。牟老师在我的一生中起了很关键性的作用，就是因为参加这个项目，牟老师劝我放弃我过去所做的儒学研究，转过来研究道教。我当时非常犹豫，我从本科到硕士、博士，都喜欢的是儒家，博士论文也是研究儒家的，在2006年出版。就是在这样的時候，牟老师让我抛弃了儒学的研究，开始研究我丝毫不懂的道教，难度非常大。我记得牟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他说，山东研究儒学的人太多了，一直存在一个儒强道弱这样的现象，今天讲齐鲁文化，这个现象一定要改变。牟老师多年一直呼吁要改变这个现象，而且牟老师一直跟我说，山东研究儒学的人太多了，山东的学术界精英分子基本都是研究儒学的。言下之意，我要是研究儒学成长会更慢一点，要进入新领域可能会成长比较快。我经过很长时间的痛苦挣扎，听了牟老师的建议，开始道教的研究，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到今天我非常感激牟老师，一点也不后悔，说明当时牟先生提的建议是正确的。我要是继续从事儒学的研究，可能不会到今天这个样子，我在这里也非常感谢牟老师，因为牟老师是我一生中的贵人，对我的指点改变了我的一生。

来参加这次会议，首先我要表达一个意思，是对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祝贺，是对牟老师的《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的出版表示祝贺。因为这个书刚拿到，我还没有系统地研读，所以不敢枉加评论。关于牟老师的著作《新仁学构想——爱的追寻》，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我回去以后，要把牟老师新出的这部著作细细地读一下，写一个书评或者是文章表达我的感想。

我和牟老师有十几年的交往，我作为牟老师的学生——可能牟老师觉得不合格，但是我确实是学生辈的，对牟老师非常熟悉。对牟老师一生的学问，我有几个感想。

第一，牟老师做学问的态度特别是对三教的态度最值得我们学习。从历史来说，儒家的学者批佛道，佛道批儒学也很正常，三教关系史就是三教之间的纷争与融合的历史，不管是明着暗着三教之间的融合从没有停止。今天学者对待三教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曾经有一次开会，我和杨老师就红脸了，他骂儒学我就不乐意，我就拂袖而去了。杨老师说你让小孩读《道德经》就是毒害小孩。杨老师是我的老师，但是我还是不同意这个观点，后来他急了，他本来是在台下，结果跑到台上去抓住话筒大说了一通。牟先生对于儒释道三家，甚至对待基督教，对待其他各教的态度是包容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佩服，这一点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研究儒学出身，也会写一些文章，因为在山东那个地方也要生存。现在主体是研究道教，对佛教有所涉猎，但是没有写过东西，不敢写。但是我对佛教、道教、儒家没有偏见，我对它们的态度受牟先生的影响，我的信仰可以是其中的一个，但是我不排斥其他的，这种态度应该是中国传统理性的知识分子应有的态度，这一点牟老师对我影响非常大，这是

第一个感受。

第二，牟老师做的学问是生命的学问。我给学生上课经常讲什么叫生命的学问，曾经给我的学生讲，衡量一个学者做的是不是生命的学问，主要看生命和学问是否知行合一。一个人是否能做到知行合一，我们有时候一生也无法验证，这个人不做坏事，我们无法验证是否是知行合一。我想出一个验证的方法，假如一个学者做的是生命的学问，生命不息，学问不止，很多学者一退休，学问就停止了，他不做了，他的生理学意义上的生命还在延续，但是文化意义上的生命已经截止了，这样做的学问绝对不是生命的学问。生命的学问是活到老做到老，把学问做到老。牟宗三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出版以后还说这个你们不要看了，很多人还没看呢，他自己就先否定了。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已经打算什么学问都不做了，后来看不下去，又翻译了康德美学的著作，在著作前面他又写了一个真善美的分辨说，很长的一篇文章。我觉得牟宗三先生在学问和人生的境界上，晚年达到了最高的境界。而且牟宗三先生临去世前，任何一个学术会议他上去讲都是没有稿子的，他一气讲下去，讲完把录音内容一整理，就是非常好的文章。他大批的著作都是录音内容和讲课笔记整理成的，他就是一个做生命的学问的学者。在牟钟鉴身上我也看到了这一点。我每次见到牟老师，牟老师都会拿一个新书给我，让我感到很惭愧，像我这个年龄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写文章、写书还不如牟老师，我得反思。我想不仅是我，在座的都要反思，我们和牟老师相比，我们都要反思，多年以前牟老师身体就不好，但是书还是不断地出，我们的身体比牟老师的身体好，我们正处在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但是我们被俗事杂事缠绕得太多，在这点上我们要向牟老师学习。从这点上来看，牟老师做的是生命的学问。我这个人也是山东人，牟老师对我也了解，我不会溜须拍马，我要是会溜须拍马，我今天不会是这个样子，我不是当着牟老师夸牟老师，我是由衷之言，我说这个话问心无愧，这是我真实的感受。

牟老师做的学问就是生命的学问。不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我都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我举几个事情。一是我们合作写的那本书《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是2005年出版的。出版以后很多人觉得很奇葩，作者一大串，六七个作者，为什么呢？这是牟老师当时坚持的，一定要把你们的名字都写上。牟老师说，这个书对我们无所谓了，但是对你们年轻人不一样，你们年轻人的名字一定要写上，而且每一章谁写的，到最后都要缀一个名字。书出版的时候，我当时的想法是：我刚博士毕业，牟老师和白老师做主编，我们就在“等”里面就行了。但是牟老师坚持一定要把我们青年人的名字都写上，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青年人的提携。我进入道教的圈子是牟老师的推荐，不遗余力地推荐，很多人见到我时说从牟老师的那里知道我的，牟老师到处推荐我们山东研究道教的几个人，真的是这样。我进入这个圈子是牟老师大力推荐的，我申请第一个国家课题牟老师也帮了很多忙。在我的书出版的时候，牟老师的身体不是很好，我想让牟老师写个书评，但牟老师还是写了书评。当时，我都不好意思找牟老师，因为平常很少跟牟老师联系，一给牟老师打电话就是有事求他，但是牟老师从来不说“你没事不来找我，有事才来求我”这类话。牟老师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提携之恩让我终身感动，我想不仅是我有这个感受，很多学界的年轻人都有这个感受，牟老师就是一个无私的长者，对年轻人不遗余力，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

第三，我读牟老师的书，还有一点对我影响大的地方，我从来也没讲过，大家也不知道。牟老师既能够高屋建瓴地抓住大的问题，又能够用通俗朴实的语言把高深的道理讲出来。我在上课的时候，我的老师经常说，冯友兰先生把最深奥的哲学道理用最通俗的话语讲出来，我想牟老师继承的是冯先生的这种风格。牟先生的著作和文章我都是通读过的，我毫不客气地说，我对牟先生文章和著作的熟悉程度可能不亚于牟老师的亲传弟子。为什么呢？我把牟老师全部发言的文章都弄成电子版，上传到了一个网站上，所有的内容都是我自己录入的，从头到尾校对，所以我特别熟悉。

我觉得牟老师的书和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通俗易懂，道理非常地深刻，讲得很好，但是

不用生僻的语言，让人看不懂的语言。在今天这个学术环境来说，牟老师写作的文笔是返璞归真的，这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也跟我的学生说，真正文笔好的在写文章时，不需要用奇怪的名词，特意写得让人看不懂，因为文章写出来就是让人看懂的，越通俗的语言写出来越容易让人看懂。我也是尽量写得通俗易懂，没有那么多非常难懂的词，这是我向牟先生学习的。

最后一点，牟老师做的学问是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这点我就不再继续展开了。牟老师在很多方面，在他所涉及几乎所有领域都有自己的观点。我觉得他的《新仁学构想——爱的追寻》将来一定会成为传世的著作。我在上一次开会的时候也说了，希望牟老师的学生可以接着这个讲，因为这个可以扩展到各种各样的领域，牟老师提供了一个大纲，或者说提供了一个架子，还需要进一步地研究，新仁学的思想可以用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

今天我又看到这个《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这部著作填补了一个学术空白，至少目前来说，还没有出现一部能够与之比肩的著作。以前洪修平先生申请了国家课题，他在书里面也说了三教关系很值得研究，但实在写不出来，后来他把他写的一系列文章抽取出版，集结成书，所以他那个不是一个成系统的书。三教关系的研究，到目前来说，很系统的五六十万字的著作这是第一部，所以我说牟老师的著作是前无古人！北大他们也在搞，但牟老师这本书肯定是绕不过去的了，他们只能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推进。著书不为稻粱谋，真真正正为了学术，这是我们后辈应该向牟老师学习的地方。过去为了评职称，为了很多世俗的目的，写了很多垃圾的文章，为什么大家笑呢，因为大家都和我一样。以后我们要向牟老师学习，没有新的创见这个文章就不要写了，只写新的创见，哪怕一年写一两篇，谢谢大家。

杨桂萍：谢谢赵老师！现在是一个共享的时代。我听到您说您把牟老师所有著作和文章录到网络上了，我特别感兴趣，如果您能共享，我非常感谢。下面请章伟文老师。

章伟文（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的章伟文，1998年到中国道教协会工作，我们研究室老前辈把我们带到牟先生的家里面。当时牟先生他们有一个任务，在做《中华大典》，牟先生就想请我们研究室帮忙做一做，李先生那时候也70多岁了，说要不两位年轻人帮着做做，我们两个就把这个任务接下来了，最后李老师做得比较好，我们做得比较差。但是牟先生对我们却非常关心爱护，给我们俩拿了钱，钱还拿了不少，我想这肯定是牟先生从自己工资里拿出来的钱。我们写完以后，牟老师把钱给我们，而且还给得不少，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接到开会的邀请，有机会来看牟先生我觉得挺好的，所以我就过来了。

关于这次会，在今天上午听了老师们对牟先生和这本书的看法，我特别同意大家的观点。牟先生做学问总是有很高的高度，总是站在非常高的高度审视文化。儒道佛三教是非常难的，为什么呢？第一是对这三教做一个知识性的了解就是很难的，更何况在了解了之后还要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是历史变化的关系，我觉得牟老师高就高在能从这个过程当中总结出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宽厚、博大，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

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学术素养和学术视野是一方面，同时也跟牟先生的为人性格有很大的关系。我感觉牟先生非常宽容，这种宽容是建立在超越的基础上的宽容。比如牟老师在这里面讲无知，不是一种世俗的知识，而是把世俗的知识放下之后的一种进步，放下了之后让每一种存在都能够以最本真的方式呈现，这样的话这个无知实际上是最好的知，把所有的一切用最本真的形式呈现出来。李老师就坐我旁边，您研究佛教的，可能我的理解不对，您多批评指正。

我觉得庄子就有这样的观点。庄子讲如果获得逍遥，就要齐物，从很高的一个高度下视万物，万物是平齐的，不存在什么地方是最好的。因为对什么地方是最安全最舒适的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同的人基于自己的立场肯定都不一样，如果我们站在这个层面讨论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肯定会有争论。我们这样的文化在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可能会面临文化与文化的冲突，这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文化矛盾和冲突的化解。佛家也好，道家也好，包括儒家在

这个问题上都有一个思考。牟先生提到文化既有主体性，同时又有开放性，我一看到这个我觉得特别地受启发，要解决文化的矛盾和冲突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有一种开放性，好比《道德经》里面说的，你要观妙，必须无，不无怎么观妙呢？你老站在人的立场上，不能把自己无掉，怎么能够理解泥鳅？在这个过程中，肯定要把自己自我的层面无掉，无掉之后才能站在万物的立场，才能发现万物之妙，这个就是开放性。这个开放性是建立在把我无掉这个基础之上的。牟先生提出的有开放性又不失主体性，常无是为了去开放，那常有是干什么呢？就是还是要保持主体性，因为再开放仍然变不成泥鳅，还得在人的层面生活，这个就得常有，常有就得看到形式之间、不同的物之间是有界限的，而这个界限本身就是主体性。我觉得牟老师讨论儒道佛三教的关系，实际上始终贯彻着一个总体的指导思想。这个总体的指导思想，一方面能够站在超越的层面，在超越的层面才能立起无，也才能消解无，同时也还是有主体性的，因为有主体性，所以在现实层面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呈现并发展自己，就是所谓的“各正性命”。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在探讨我们所说的儒道佛三教关系的时候，体现了牟先生高屋建瓴的学术思考。我觉得牟先生是有这样的思考的，否则很难对这样的题目有一个很好的梳理。

因为牟先生这部新著只是刚拿到，还没有仔细研读，拉杂言之，请各位方家批评。我上午翻了牟先生给他父亲牟广熙老先生整理的那本书，老先生特别有文化的意识和文化的精神，老先生作为乡贤，不一定政治地位有多高，但是天下事应由天下人去关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老先生有这种精神，我看了之后还是挺感动的。大部分人都是为养家糊口才去选个事情做的，选择了这个事情就得去做，缺乏了一种老先生所具有的、同时也是我觉得我自己所缺乏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现在这个时代环境看来是没有这种担当意识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生活层面的需要对人的约束和压迫太强了。但是我觉得老先生的生命当中有一种精神，前面有学者说到“生命的学问”，说到“活到老学到老”，这些当然都是这种精神的表现，但我觉得这种精神还有一重内涵，那就是把理想化为生活当中的细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文化的精神时时刻刻地做一个呈现，这个也是我对生命的学问的理解。老先生不一定是专门做生命学问的，但是我觉得老先生真正体现了生命的学问。如果像我们这种情况，虽然说是在高校做学问，但还真不能有像老先生这样的生命的学问，因为我们是靠一种他力维持，不是靠一种自觉，还不是自己生命内在的呈现和发挥。

今天来参加这个会，收获很多，回去之后我还要好好再学习，谢谢各位老师，谢谢牟先生。

杨桂萍：谢谢！下面请孔德立老师。

孔德立（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尊敬的牟老师，各位前辈、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现在供职的单位是北京交通大学文化教育中心，同时我还担任孔子后裔组织——中华孔子学会孔子后裔儒学促进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个会是2016年在曲阜成立的。当时成立的时候，牟先生也发了贺信，对我们给予很大的支持。今天这个会也有两位副会长参与活动，牟老师是山东老乡，刚才卫东兄已经提到了。

我个人向牟老师问过学，感到牟老师对齐鲁文化、儒家文化、中华文化有独特的情怀和责任担当，是我本人和广大孔子后裔所敬仰的先生。从牟老师对我本人的教诲来讲，我自认为我是牟老师的弟子。牟老师说用儒学的精神做儒学的事业，真正的儒者是包容、谦和的，是有担当与情怀的。今天，牟老师的大作出版，并作为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的奠基之作，我代表北京交通大学文化教育中心，代表我个人向研究院的成立，并向我会的顾问牟钟鉴先生表示热烈的祝贺，向牟先生大作的出版致以诚挚的祝贺！

祝愿在诸位先生的努力下，新时代的研究院将迅速成为中华文化研究领域的重阵。听了上午各位嘉宾的演讲及前面几位嘉宾的发言，我汇报如下几点感想。

第一，方法论的意义。牟老师的著作《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系统研究阐发了儒道

佛三教关系,进而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研究阐发“多元通和”的文化模式,为我们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个研究范式。所以,牟老师这部新著的意义不仅是内容的,更重要的是方法论的启示。

第二,学术价值。牟老师给学术界奉献了极具创新性的成果,文化自信要以文化自觉为前提,文化自觉要以扎实的学术功底为前提。《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的出版,基于牟老师多年长期专注的研究,才能写出来。他这部著作,其中有“简明”两个字,但是并不简明,写出来是通俗的、是简明的,是我们可读的,实际上是博厚的大作、巨作。刚才章老师的发言提到广熙老先生的儒者情怀,2017年我就参加了“民间儒学与乡贤文化研讨会”,牟老师毫无疑问传承了广熙老先生的学识和精神。我有一个想法,牟老师写出这部巨作来,从学术来讲,是填补空白之作,是儒者情怀的牟老师写出来的。要完成这部填补了学术空白的著作,需要有佛学的知识基础,也需要有道学的知识背景,但更需要一个儒者担当有为的精神和一个宽广的情怀。从第二个方面来讲,还有一个家学的传承。虽然广熙老先生是民间的儒者,但是情怀非常高。当时老先生来北京,看到绿化有问题,就给绿化委员会写了一封信,他经常听广播,非常关心国际关系,这是一种情怀,特有的中华文化积淀出来的一种情怀。

第三,教学的意义。我在大学教书,学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经常会让我提供参考著作,我手上也没有。现在牟先生的著作出版了,这下就有参考书了,不光是专业课,选修课也有了,所以我们在高校里面要迅速地把这个教材补充上去,因为这是急需的。

第四,对于社会上的大众来讲,对于关心中国文化的大众来讲,牟老师奉献了文化普及的优秀精神食粮。这种书如果我们扩大宣传和推广的力度,肯定会有人关注的。

第五,对于治国理政的意义。2013年8月19号,习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有一个指示,叫“四个讲清楚”,为什么现在有人会误解,是因为没讲清楚,他这个会议是给宣传思想口讲的,但是对教育和研究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刚才卫东兄也提到,有些人写出来的文章读者读不懂,读者读不懂还是因为写的人没说清楚,还是表达的问题,讲清楚的前提是研究清楚。前段时间,我和于老师去了趟泰国和越南,发现泰国《论语》的版本是从英文版翻译过去的,没有一个是从汉文版翻译过去的。越南还是有汉文的,但是越南哲学所一个著名的汉学教授跟我们一聊,我们发现全都是误解。越南要比泰国还好一点,泰国的翻译有更多的误解,这就是没讲清楚。对于治国理政来讲,牟老师以深厚的学术功底讲清楚了儒道佛三教关系,从而为宣传、宗教、民族多领域的治国理政提供了指导。

第六,对外交往的意义。田辰山老师在夏威夷待了20多年,长期从事中外比较哲学的研究,哪些书翻译过去外国人能看懂他是知道的。田老师说这本书外国人能看懂,所以我们要尽快启动外译工作。儒道佛三教关系的理论在历史和现实中,为解决中外关系史可以提供借鉴,这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特别是中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可以提供理论支撑。牟老师这本大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论提供了历史经验的根据和学理上的依据。上次出访有一些体会,我们看了泰国的庙宇祭祀,祭天地父母那是儒学,祭财神跟道教可能有关系,还有观世音菩萨等,都弄在一块儿去了,这就是多元通和,我们的研究对于和东南亚的国际交往包括其他国家的国际交往都是有意义的。

第七,因为我在孔子后裔儒学促进委员会组织里面担任职务,这部书对我的工作无疑是有指导意义的。我们在工作中总会碰到一些历史的和现实的问题,比如孔子后裔的问题。孔子后裔的分布非常广,2009年出版了80册的家谱,涉及14个民族,有汉族、回族、藏族、彝族、水族、白族、土族、撒拉族等,同时还涉及多种宗教信仰,有信仰佛教、道教的,有信仰基督教的,还有信伊斯兰教的。但是,我们看到明朝时孔尚贤制定的《孔氏祖训箴规》里面有一条,只要是信外教就不能入谱。在现代“多元通和”的背景下,这里我们就要做一个变通,对于未来统战工作会有很好的意义。

这是我以上的想法，不当之处还请批评指正，谢谢。

杨桂萍：谢谢孔老师的发言！我们这几年在大力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在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像新仁学、儒道佛三教关系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对外传播的文化产品，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素材。下面请北京行政学院的王志捷老师。

王志捷（北京行政学院教授）：牟老师好！各位老师好！刚才几位老师都谈到了，牟老师做的是生命的学问，他在做学问的时候从来不满足于进行知识的解读和材料的考证，他也从来不是只把治学当作职业，而是把生命和学问当成一个整体，自己就活在这个有机体中。牟先生特别符合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典型中国哲学家，他不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坐在靠椅中，与世隔绝地进行冥想，不是这样的，他一定要谋求学问与生命体验及生活世界打成一片，这个是我对牟先生生命之学的理解。

我在想，若是把牟先生的学术思想作为一个体系来理解的话，那就必然要有一个核心理念，也就是所谓“体”，这个“体”我认为就是儒家的仁学精神。中国哲学讲“明体达用”，而牟先生所致力“用”就是“和”。所以两年前，在牟先生的《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那本书出版以后，我就想能不能对他的思想作一个概括性的探析。当时我发了一段文字给牟先生说，想把他学术思想的特点概括为“仁体和用”，牟先生基本认可。

“仁体和用”可以从这几方面来理解。第一，牟先生学术领域很广泛，但不是“杂而多端”，而是既广博又专精。他的所有研究，无论是哲学史还是宗教史，儒家经学还是三教关系，以至一般文化史，都是紧紧扣住儒家的仁爱精神，都落实到这个精神上，体现这个“体”。至于谋求致“用”，即达到“和”，也体现在牟先生所有的学术作品里。在《新仁学构想》所建立的理论框架里，无论是仁学的思想资源还是辐射领域都很广泛，传统的和现代的，人文的和自然的、国内的和国际的、中国的和西方的，都纳入进来了，这体现了多样性的统一，也就是“和”。这种广泛的“和”，是“仁”这个“体”的落实，是爱的精神的落实，所以说是“仁体和用”。第二，牟先生在学问上从来都是主张一种包容的精神，一种温和的精神。我体会最深的就是他在宗教学上提出的研究宗教的态度。他首次提出“温和无神论”概念，既划清了与法国战斗无神论的界限，也超越了苏联的“宗教鸦片论”和“与宗教斗争论”的激进主义，认为宗教学者对待宗教的恰当态度，既不是信仰宗教，也不是反对宗教，而是用理性去说明宗教，以破除歧视，提倡包容，发挥宗教文化的正面功能。他特别赞赏汤用彤先生讲佛教史时提出佛教既是哲学又是宗教，对之要抱有“同情之默应”、“心性之体会”的态度。按照他对汤先生这个提法的理解，宗教感情是宗教信仰的内在因素，宗教体验其实也是一种情怀，要获得它的真意，就需要“同情之默应”，而其中所蕴含的哲学，精微深远，需要通过心性的体会，才能得到其精髓。所以，牟先生发挥这一观点，提出研究宗教应该在信与不信中间，不要把宗教作为对手，一定要带有深切的同情和默应，进得去也能出得来，这体现了对待不同信仰和文化所应持有的仁和精神。

我是今天早上才看到这本书的，大家在讨论中也注意到，这本书里有一个关于中华文化“多元通和”模式的非常新颖的概括，就是“一、二、三、多”，我觉得这个“一、二、三、多”，就是体与用的关系：一是儒，是“体”，其精髓是“仁”；儒道互补是展开，是基本线索；儒道佛三教互动融合又是一个展开；最后是在这个基础上又包容各家各教，从而达到“和”。中国文化有着巨大包容性，外来文化进到中国来，一定要接受儒道互补的影响，进而实现多元通和。这里面始终有一条精神贯穿着，那就是仁爱的精神，所以说这个多元通和是“仁和”，就是“仁体和用”。刚才何建明老师说过，牟先生不是刻意构建一个仁学的本体，一个形而上的本体论，我想实际上他的整个学说当中仁爱就是主导的精神，就是“体”。在当代中国文化复兴的运动当中，儒家的仁学精神就应该发挥出全面的作用，要兼顾各方利益，我想这也是一个仁体和用理念的具体落实。

按照牟先生的理论，整个中华文化宏观上可以厘为三教六家，分属三个子系统：儒文化、

禅文化、道文化。在这三个子系统里面又分别有哲学的层面和宗教的层面。哲学层面更多体现为理性，宗教层面更富有直觉和体验。但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实际上都有宗教性。同时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大多数人不是虔诚信奉宗教的，但另一方面又普遍受到宗教很深的影响，宗教最后在中国也变成了哲学。三教统一起来看，就是亦哲学亦宗教。对于中华文化，牟先生主张要有一种生命的体验灌注在其中，这特别符合中国生命哲学的精神。另外，他提出中华大道的特色和本质是“中和之道”，为儒道佛三家所共有，他本人特别倡导这种和谐精神，事实上也是他自己在经历了国家和个人的诸多磨难，特别是进行了学术思想观念上的深刻反思和巨大转折之后而做出的价值选择。这个过程无疑是很艰难的，牟先生自己在学术自述中也讲过，他经过了两次重大反思和突破：一个是反思苏联和中国文革的那一套，另一个是反思西方。最后要回归中华文化天人一体、天下一家、仁爱忠恕、和而不同的精神和智慧，并要把这个贡献给世界。他提出仁学三大命题，实际上最终还是可以用第一个命题概括，就是“以仁为体，以和为用”，这能比较好地概括整个新仁学的精神。

今天看到《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感到牟先生研究哲学史、宗教史、思想文化史，是以佛、儒、道三教关系为主轴的，实际上揭示了在儒家仁爱忠恕精神的主导下，中华文化所具有的极强的和谐性和包容性。这个也体现了“仁体和用”。

牟先生无论是在学问上还是在做人上，对我、对周边的人影响都很大。今天各位学者的发言，都在赞美牟先生的道德文章。牟先生不仅只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还身体力行地去做，这真实地体现了中华学人以身载道的优良传统，我们也要努力发扬这种精神。我就说这些，谢谢！

杨桂萍：好！谢谢。下面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马晓英老师讲两句。

马晓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非常感谢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谈谈对读牟老师这本书的感想！这本书是我今天早晨收到的，因为非常厚重，还没来得及细读并消化吸收，现在就简单地翻看了一下，看了目录和序言。我有一些感想，主要谈五点。

第一，就像今天上午和下午很多老师都提到的，这本书在国内是开创性的著作。三教关系大家都在关注，但是怎么系统地梳理出三教关系的历史这还是第一部。这是一本非常高屋建瓴的、贯通性的著作。在对三教的关注当中，很多人做的都是一个领域，现在的学术分工越来越细，但是有的时候过细就跳不出文本，集中在某一种思想、某一个学派乃至某一个人物身上，要跳出来，还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即使做到，很多人可能是做儒家或者道家的，只能在自己这个领域做到很精通，但是在三教整体把握上就很难说了。做三教关系，我认为牟老师是最有资格和条件的。牟老师是做道家道教研究出身的，后来做了很多关于道家道教的研究，积累非常丰富，在这中间一直也做儒家，这些年又提出了新仁学的理论构架。在佛教方面，牟老师自己非常谦虚，他说对于佛教的研究不够精深。可是我知道他做的三教关系研究，除了牵涉到一些很复杂很细碎的问题没有能够充分展开外，佛教的主要著作牟老师都是非常精细地读过的，从这点上看，他有非常深厚的三教基础，但是他又跳出三教之外，有现实关怀，认为中国文化有一个“多元通和”的模式，所以这本书是牟老师多年儒释道思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这对我们也是非常大的一种启发。我觉得我后面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消化和吸收这本书。

第二，这本书给我的感觉是极富思想上的创造力。这本书里有很多都是牟老师原创性的提法，比如新仁学的构想，比如说中华文化“多元通和”，比如说中华大道的中和特质，这些提法都融入了牟老师的这本著作当中。为什么我说这本书体大思精？因为不仅有很宏观的理论和历史的梳理，还有就是能将一个理论贯彻首尾。

第三，我想谈谈牟老师的“多元通和”模式。大家都提到这一点，上午还有学者说这是学界的一个共识，牟老师就是把学界的共识以非常简明扼要，特别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出来，让大家都能接受，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大家都特别强调多元，不过我看完，倒是觉得

牟老师固然提倡多元，提倡从一到二到三到多的模式，但也非常强调“一”，这是体。大家都讲多元，刚才志捷师兄也说了，多元通和模式其实就是不断地积累，层层推进的关系。这里面体一定要立下来，这个体我理解的就是儒家积淀的仁。牟老师提出新仁学构想，贡献了一整套理论体系，这就是对儒家传统的综合创新。

我觉得牟老师是真正能做到知行合一的，他的学问、思想、理论观点都体现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在自己的生活实践当中是把它学问思想都贯彻了。牟老师可能是比较低调内敛，有点道家洒脱的精神。但我个人认为，这个只是表象，牟老师骨子里还应该是一个儒家。我们看牟老师所有的著作都有特别强烈的现实关怀，积极入世，是以儒为主的。美国汉学家艾愷说梁漱溟是最后的儒家，现在看来这个说法是不是需要修正一下？我不是说牟老师是最后的儒家，而是说在儒家的薪火传承中，牟老师至少还是接续了一下的。牟老师在很多书里也提到孔孟仁学的传统，提到诸子，提到近现代的康梁等等。再往后在当代，我觉得牟老师至少是其中一个，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但是牟老师本身接不接受，认不认可，还有争议。这仅仅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感受。

还有一点，前面有几位老师也提到了，以往讲三教关系讲的都是从学理、从学者这个层面，牟老师这本著作里面在第七章和第八章讲到儒释道三教关系从精英如何下移到民间，又如何从学术思想领域扩展到文学、扩展到其他学术或者人文领域。从时间线索上，从上古一直通到现代；从空间线索上，从精英到民间，两方面都具备，所以牟老师这本著作是非常完整的三教关系的一本书。这里面还有一些特别细的地方，因为牟老师用词非常简洁，里面有一些内涵需要大家继续深度挖掘，再做一些补充性的工作。

最后一点，刚才各位老师都提到了，这本书结构特别清晰，层面非常明确，语言又特别平易，大家都觉得把这本书非常适合作为大学教材，我建议从中华文化研究院开课先推广，然后再可以更进一步向全社会推广，这对牟老师学术的下移，学术的民间化，是一个特别好的开端，特别好的契机。

王志捷：我刚才看了这本书以后也有这个感想，我觉得可以开好几讲课了，原先牟老师的新书出来，比如《当代中国特色宗教理论探讨》出来以后，我就根据这本书开了一门课。牟先生的著作就是这样，不像现在一些书全是从别的地方扒下来的，它是一个体系，给了你一个框架。

杨桂萍：好的。谢谢诸位的精彩发言，也非常感谢尊敬的牟老师、梁老师、佟老师，他们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先生，80多岁了，在这儿坐了一整天，感谢各位远道而来的专家朋友，感谢大家，下午这场讨论到此结束，谢谢！